

[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 ARNOLD TOYNBEE
刘北成 郭小凌 译

历史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

THE ONE-VOLUME EDITION

ILLUSTRATED

(修订插图本)



历史研究

ARNOLD TOYNBEE

OF HISTORY

[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北成 郭小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英)汤因比(Toynbee, A.)著;
刘北成,郭小凌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书名原文:A Study of History

原出版者:Thames and Hudson, 1988

ISBN 7-208-03398-6

I. 历... II. ①汤...②刘...③郭... III. 历史哲学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8297号

A Study of History: (The One-Volume Edition) Illustrated

Copyright © 1972 by Arnold Toynbee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上海人民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and Hudson Ltd.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 范蔚文
特约编辑 顾兆敏
装帧设计 王晓阳

历史研究

(修订插图本)

[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北成 郭小凌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0 插页 42 字数 959,000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6,001-16,000

ISBN 7-208-03398-6/K·805

定价 88.00元



序 言

本书内容如书名所示，试图将人类史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这意味我的考察始自人类史的开端，终至当前的1972年。同时也表明本书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考察。

就时间而言，我们的视野不只局限于规定的范围之内。在我们的动物祖先演变成人之后的最初50万年或大约100万年时间里，^①我们人类是很原始的，除了一些骨骼和旧石器，没有遗留下什么记载的东西。农业、家畜驯养、陶器制作和纺织技术仅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而文明存在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五千年。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人类史其实都处在相对晚近的时代。从地理上对历史进行全球性考察，较从时间上考察要相对容易一些。但为了持有一种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观点，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成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对于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他的先辈们的立场，出乎意料地成了全面认识这个世界真实景象的障碍。

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呢？为什么要关照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在地域以外的事物呢？这是因为现实要求我们具有这种较为宽广的目光。在最近500年时间里，地球的整个表面，包括大气层，都因为惊人的技术进步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人类在政治上却尚未实现联合，我们彼此之间仍然是按照各自的方式生活的陌生人。这本来是我们从“消除距离”之前的时代继承下来的遗产，现在却使我们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说明了这种危险。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为此，我们必须相互熟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熟悉彼此的历史，因为人类并非仅仅生存于直接的现在。我们生活在一条思想的河流当中，我们在不断地记忆着过去，同时又怀着希望或恐惧的心情展望着未来。

这种对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显而易见和无可争辩的。即使我们不是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来研究历史，我们也应受好奇心的驱使而对它表示关注，因为好奇是人性的显著特点之一。即使我们的生活已经非常繁荣且有着可靠的安全保障，

我们仍应对我们置身其间的宇宙感到惊异。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无论在何时何地）实现过这两个理想的目标。

我是积个人经验认识到这一点的。促使我研究历史的动力是贯穿我一生的好奇心。从我能记事的幼年起，我就有了历史的头脑。我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她对历史的兴趣感染和激励了我。我也是在曾经当过水手的叔爷的影响下长大的。他曾是一条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种三桅横帆的海船）的船长。有关他远航至印度和中国的故事曾令我激动不已。所以，我开始研究历史是出于好奇，尽管我是在幻梦中长大成人的，以为我将在一个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和平的世界中安度自己的一生。直至1914年8月，当我26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要全面研究历史的真正理由。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唤醒了我去认识现实。也正是这一事件使我察觉到处理浩如烟海的史料的可行方法，而史料则是全面深入地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基础。

1914年我在牛津大学教书，讲授古典希腊的历史。那一年的8月，我的头脑突然闪出一个想法，公元前5世纪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已经体验到了现在令我惊诧的东西。他同我一样，为他所在的世界分崩离析、各邦间展开相互残杀的大战所震撼。修昔底德已预见到，他那一代经历的大战开启了他当时所处世界的新纪元，后来的结果证明他是正确的。我现在看到，古典希腊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的历史就经验而言，彼此之间具有共时性。二者的历史过程也是平行演进的。我们可以对它们做一番比较研究。不久我还发现，希腊史和西方史乃是同类事物的两种范例，该类事物还有一系列其他样板。我当时计算出21种文明，现在抛开一些已灭亡的不算，我则统计出至少有31种文明。对于比较研究来说，20或30个样本足以说明问题了。

教导我广泛研究历史的人是我的母亲、我的叔爷，修昔底德以及另外两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波里比乌斯。这两个人也写过他们目力所及范围内的广泛的世界史。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对死记硬背英国各郡的名称和英国历代国王的生卒年代感到厌烦。而以以色列和犹太^②的国王据称作恶多端，几乎乏善可陈，却激起了我对他们的邻人——亚

述人和埃及人——的好奇心。我在大不列颠博物馆能看到这些古代居民遗下的一些给人深刻印象的纪念物。我对希腊与拉丁文献,包括诗歌、哲学与历史文献的认真钻研,拓宽了我的思路。1914年8月,修昔底德曾给我过一个至今仍未摆脱的震撼。在1915和1916年,我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在其他交战国当中,我的同代人死亡的比例也不亚于此数。我在世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

从1920至1972年,我一直致力于《历史研究》的写作。在1920年的夏天,我进行了首次尝试,但未获成功。1921年夏,我在伊斯坦布尔到卡来斯的火车上,草草拟定了各部分的题目,其中大多可在这部修订插图本中找到。未经删削的全本共计12卷。自1927至1939年,我抢在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面赶写这本书,在大战爆发前40天出版了头6卷。1954年我又出了7至10卷,1959年第11卷(《历史地图和地名集》)问世,1961年则出版了第12卷(“反思”)。

自1924至1956年,我在撰写《历史研究》一书的同时,还为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写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之后又同我的妻子一道编写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史。这两项庞大而耗时费力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我不同时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干不成。我始终是脚踩着现在和过去两只船。在这本《历史研究》的修订插图本中,我同样是二者兼顾,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因为当你研究现在和过去的时候,对未来不可能视而不见,倘若这是可能的话,那反而荒唐可笑了。

这部《历史研究》修订插图版是相互合作的产物。它的问世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泰晤士及哈德森出版公司之间一项协议的结果,由简·卡普兰小姐和我共同完成。

本书的形式在某些方面既不同于原来的12卷本,也不同于由D.C.索麦维尔节录的10卷本。

这是头一部插图本,配合文字说明的各幅插图赋予这部书以新的内容。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所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插图是由泰晤士及哈德森出版公司的布鲁克纳太太收集的,而从布鲁克纳太太提供的图片中挑选一部分作为本书插图的工作,则是同卡普兰与我商量后才进行的。插图说明词由卡普兰小姐起草,经过了

我的首肯。

在卡普兰小姐发现并填补因时间拉开的空白以及在布鲁克纳太太为卡普兰与我合编的这个新版本配图之前,都必须熟识本书原版的布局和内容。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所以我对完成此项任务的这两位同事表示深切的感谢。她们勤恳的工作使得眼下这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这个修订本是我独自难以完成的。如我先头所说,这是一部合作的产物。但在指出这一点时,我需要做一点保留说明,即对本书的批评应是仅针对我一个人的。我的思想与我的这两位同事的研究相比,要更薄弱一些。

目前这个版本同索麦维尔的版本一样,是一个删节本。但本书的删节依循不同的思路。书中能看到一些索麦维尔的修订本以及初版头10卷所没有收入的课题。经索麦维尔压缩的版本成功地再现了初版头10卷的整体结构,却不可避免地舍弃了我的大部分历史例证,而那正是我的论点的支撑。现在这个版本则收入了初版当中的那些例证,而且还有可能保留了更多的细节。作为补充卷的第12卷(“反思”卷),现在也被头一次纳入本书的主要内容当中。

本版还有了讨论1961年“反思”卷问世以后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及发现的可能。例如,讨论了战争艺术虽不断“更新”,却令人啼笑皆非、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的历史(不幸的是,这个故事仍然没有终结)。先前无人知晓的非洲撒哈拉南部的地方文明史也同其他地方文明并列在一起,被赋予了适当的位置。1927年,当我开始为本书头10卷做笔记的时候,人们以为热带非洲和南非,在阿拉伯人与西欧人到来之前,一直是个无历史的地区。但从那以后,一方面因考古发现的结果,另一方面因对早期幸存下来的文献证据进行认真研究的缘故,这一非洲主要部分的历史被重新找了回来。我们现在知道,在热带非洲,农业和冶金技术拥有堪与西欧的相关历史媲美的历史。东亚的早期文明史,东亚各个时期的经济与社会史,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相当清晰的焦点。我们在埋头劳作时,中国则一直在世界主要事务中重新扮演着正常的角色。在目前这个版本的研究中,我们试图记述这些或其他有关人类事务的新增知识以及新近的理解。

在古希腊的两部伟大史诗之一《奥德修记》中,有一个关于海神普罗泰乌斯(Proteus)^③被一位叫迈奈劳斯(Menelaus)^④的希腊流浪者绑架的故事。迈奈劳斯自特洛伊战场返家途中迷了路。如果绑架者将普罗泰乌斯抓牢不放,他就会被迫告诉绑架者有关他们的命运。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普罗泰

乌斯对付绑架的办法是不断变形。英语中的“变化无常”(Protean)一词便由此而来。历史就是变化无常的事物。你还没有抓住一种形态的历史,它已经像普罗泰乌斯一样改变了自己的形状,有时简直变得面目皆非。

变形恰恰是历史的本质,因为历史的本质正在于不断地增添自身。从1914年8月我最初产生撰写这部著作的冲动时起,到目前这一卷的面世,历史已经增添了不只58年的内容。每一次的增添都改变了历史的整体,因为整个过去都由于我们新的生活经验而显得有所不同。譬如,对我来说,修昔底德笔下的希腊,在1914年8月看上去就与1914年7月有着差异,因为在此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它对以往世界史的总和确实增添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東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令人震惊的,但它的奇特性却不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些其他突发事件,也同样改变了历史的整个面貌。例如,中国在公元前221年的政治统一;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跨越赫勒斯滂海峡;公元633年,阿拉伯人突然越出阿拉伯半岛;蒙古人在13世纪自东北亚大草原的突然崛起。还有一些更加令人吃惊的事件是逐渐发生的,如希腊和中国哲学的发展,犹太一神教的形成,宗教传教团体的传布,农业的扩散,水利的利用等等。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创造新事件、改变过去的整个面貌上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同时,我们的时代大概也有两点与先前时代有所不同。

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是由于现代技术的惊人进步,导致“距离消除”,致使变化以空前的速度加快进行。现在历史被如此迅速地创造出来,以致它常常使我们惊诧不已。我们时代的第二个特点是已逝的过去变得越发令人捉摸不定。它的面貌不仅因我们日新月异的新经验而一直在变化,而且因考古学家们的新发现而一再发生更动。考古学家们不断有革命性的新发现问世,并且不断对他们先前的发现予以革命性的新诠释。他们用变化无常来弥补四平八稳的不足,而考古学理论方式的剧烈变更则突出了考古学家们对过去的认识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无论如何,这种转变是因他们所了解的事实知识的增加而应运而生的。

自从拿破仑于1798年侵入埃及以来,在美洲以及在旧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尽管不太一帆风顺,但对诸文明的比较研究毕竟已做出不可缺少的贡献。

从那时起,考古学家们已发掘出一些文明的遗迹,如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马雅文明,以及中国的商代文明。这些文明本来已经彻底湮没无闻了。他们还通过破译古埃及的文字记录复活了法老时期的埃及文明,这一文明的大量古文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他们随后又破译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迈锡尼文明以及中国商朝的文字记录。由于考古学家的发现,各个文明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已不再是难以接近的了,它们增加了已知文明的数量,使得比较研究各个文明成为可能。同时,考古学家们一直在不断修改着文明行将兴起时的历史面貌,其变更之速,毫不亚于科学家、技术人员、独裁者、征服者对20世纪历史面貌的变革。

基于这些理由,本书现在这个版本与1934至1954年间出版的原10卷本有着广泛的不同之处。基于同样的原因,目前这个版本由于历史事件的长河不断地流动以及知识的持续增长注定也会过时。只要人类继续存在,无论历史还是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不可能永恒不变。如果本书有助于读者对既令人畏惧又令人着迷的人世变迁采取一种全面的看法,那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阿诺德·汤因比

① 汤因比显然认为真人或晚期智人之前的猿人时期不属于人类史的范畴,这同古人类学界中存在的部分观点相一致。但就多数人的意见而言,人类史的开端被设定在能人即制造工具的人形成时期,时间约在200万年前。——译者注

② 犹大王国(Judah)旧译为犹太王国,显然与原词发音及含义不符。——译者注

③ 普罗泰乌斯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记》4章354—359行)是一海中老人,海神波赛冬的仆从,具有未卜先知和变形的能力,经常在帕洛斯岛休息。迈奈劳斯从特洛伊战场返家途中迷失航路,困在帕洛斯岛。普罗泰乌斯之女埃多塞雅帮迈奈劳斯紧紧抓住其父,最终使迈奈劳斯返回家园。在晚后的传说中,如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犹里庇底斯的剧本《海伦》中,普罗泰乌斯则是波赛冬的儿子,埃及国王。——译者注

④ 又译墨涅拉依、曼涅劳等,斯巴达(与后来的斯巴达非一国)国王,传说中的希腊霸主迈锡尼王阿伽门农之弟。其妻海伦为绝代佳人,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遂引发希腊亚该亚人群起围攻特洛伊的战争。——译者注

目 录

序言阿诺德·汤因比

第一部 历史形态

- 第 一 章 历史思想的相对性3
- 第 二 章 历史研究的领域.....14
- 第 三 章 某些术语的定义.....19
- 第 四 章 需要对人类事务进行全面研究.....23
- 第 五 章 过渡的社会.....25
- 第 六 章 文明的比较研究.....30
- 第 七 章 希腊模式与中国模式.....33
- 第 八 章 犹太模式.....44
- 第 九 章 对各个文明的考察.....50

第二部 文明的起源

- 第 十 章 关于各文明起源的性质.....57
- 第 十 一 章 文明源于种族吗?64
- 第 十 二 章 文明源于环境吗?69
- 第 十 三 章 挑战和应战.....73
- 第 十 四 章 卓越出自艰辛.....91

第十五章	艰苦环境的刺激	95
第十六章	惩罚的刺激	101
第十七章	流产的文明	106

第三部 文明的成长

第十八章	成长停滞的一些例子	113
第十九章	成长的标准	117

第四部 文明的衰落

第二十章	决定论可信吗?	127
第二十一章	模仿的机械性	135
第二十二章	角色的转换	143
第二十三章	雅典和威尼斯:短暂的 自我崇拜	148
第二十四章	东罗马帝国:对一种短 命制度的崇拜	158
第二十五章	大卫和歌利亚:对一种 暂时性技术的崇拜	173
第二十六章	罗马教廷:对胜利的陶醉	179

第五部 文明的解体

第二十七章	社会解体的性质和征象	195
第二十八章	内部的无产者	203
第二十九章	外部的无产者	209
第三十章	灵魂的分裂	217
第三十一章	解体的挑战	225

……95
 ……101
 ……106

第六部 大一统国家

……113
 ……117

- 第三十二章 大一统国家:目的还是手段? ……235
 第三十三章 传导与和平所带来的好处 ……247
 第三十四章 沟通 ……258
 第三十五章 语言与文字 ……267
 第三十六章 首都 ……273
 第三十七章 文官制度 ……279
 第三十八章 未来是否会有大一统国家? ……287

……127
 ……135
 ……143

第七部 大一统教会

……148
 ……158

- 第三十九章 毒瘤还是蝶蛹? ……293
 第四十章 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 ……300
 第四十一章 宗教是社会对幻象的回应,
 还是对实在的回应? ……309

……173
 ……179

第八部 英雄时代

……195
 ……203
 ……209

- 第四十二章 蛮族的历史 ……321
 第四十三章 幻象与事实 ……337

……217
 ……225

第九部 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

- 第四十四章 同时代文明的相互接触 ……345
 第四十五章 现代的西方和俄国 ……352
 第四十六章 现代的西方和东亚 ……358
 第四十七章 世界与亚历山大以后的

	希腊社会的接触	367
第四十八章	同时代文明相互接触的 社会后果	374
第四十九章	同时代文明相互接触的 心理后果	381

第十部 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

第五十章	制度、法律和哲学的复兴	399
第五十一章	语言、文学和视觉艺术的 复兴	407
第五十二章	宗教的复兴	415

第十一部 为什么研究历史？

第五十三章	历史思想的性质	423
第五十四章	行动中的历史学家	429
	地图	439
	大事年表	457

第一部

历史形态

我是从寻找一种历史研究的单位入手，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个单位应当相对完整独立，或多或少有别于其他历史成分，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对其感知并能够加以理解的。我舍弃当前根据国别来研究历史的习见做法。我的单位似乎是某种范围更大的碎片，这就是文明。人类在解释某个事物之前，总需要对它进行分类。在我看来，这种大范围的单位与小单位相比，易使人少产生一些曲解。在明确了划定的单位以及考察了前文明的各个社会之后，我试图从希腊史、中国史、犹太史的过程中抽出我的线索，以便为文明史构建起一种“模式”。我通过归纳这些文明的主要特征，提出一个似乎适合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文明史的综合模式。本章的结尾则是我拟定的一个有关过去和现在文明的一览表。

换。
一般
某个
这些

第一章 历史思想的相对性

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祇鼻子扁平、皮肤黝黑，色雷斯人则说他们的神祇长着一双蓝眼睛和一头红发。倘若牛马也像人类一样有两只手，并打算用双手绘画或者制作艺术品，那马匹也会仿照自己的模样来绘制它们的神像，牛的神像自然也一定像牛，它们都会依自身的模样塑造神祇的身体。^①（色诺芬语）

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历史研究都同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受到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的控制。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方世界一直生活在两种制度的统治之下：一种是工业化经济体制，另一种是我们称之为“民主”的、几乎同样复杂的政治体制。民主这个简洁的字眼是指在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当中负有责任的代议制政府。这两种制度，一种经济制度，一种政治制度，于上个世纪的末叶，在西方世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②其原因在于它们为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的难题提供了暂时的解决方案。它们的登堂入室标志着寻找自救出路的那个时代的终结。它们能够幸存到现在则证明我们的前人所具有的创造力。我们虽不是这两种制度的创造者，却是在它们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仍然生活、行事和存在于工业体制与代议制的国家当中。这两种因袭而来的制度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反映在对我们想象力的控制上。它们的权威影响简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著作中无所不在。

工业体制在劳动分工方面有着人文的一面，但在把西方现代科学思想应用到与人类生活相关的自然环境时，又具有非人文的一面。它的运作方式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产能力，通过一些人之间机械式的合作，将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转化成商品。这种工业体制的特征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20世纪西方的思想实践中一直被复制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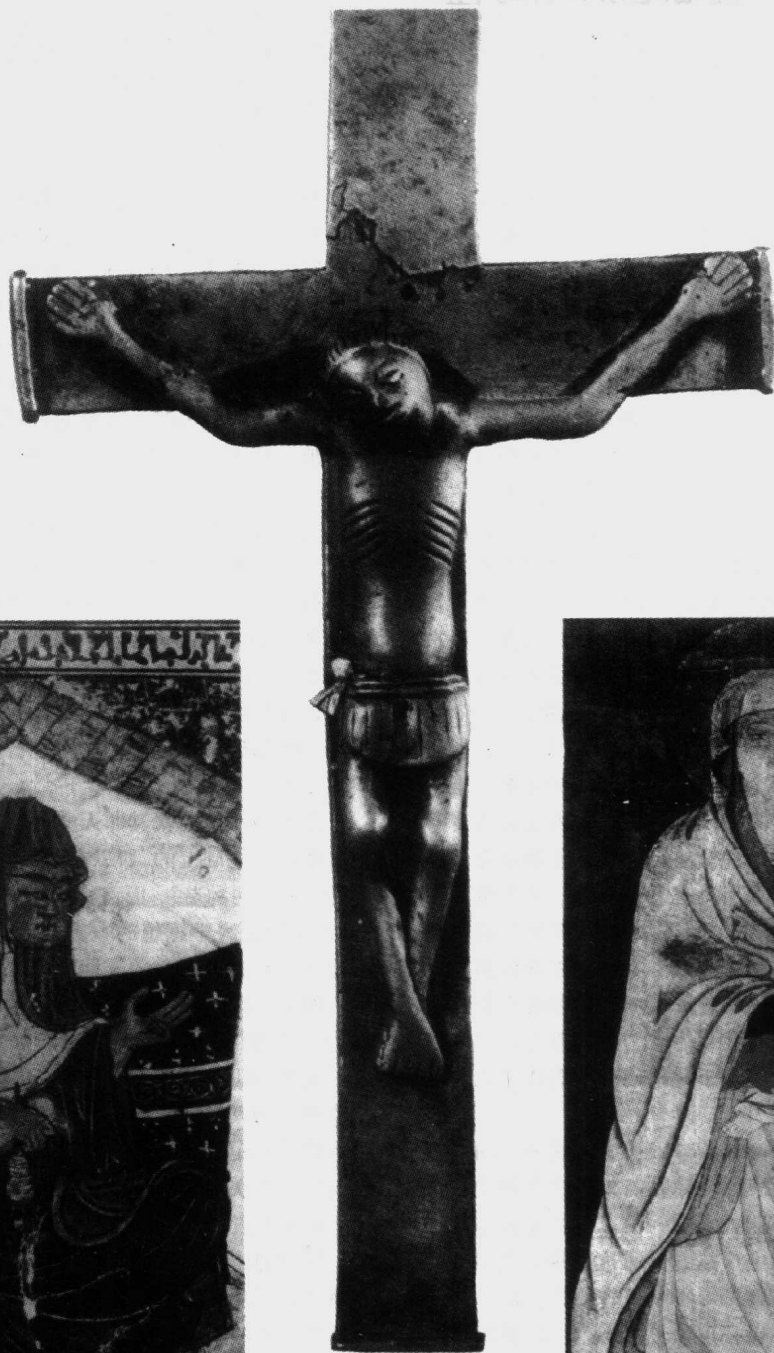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时常在一位自然科学的名教授家里逗留。他有一间布满书架的书房。我记得，我每去一次那间书房，架上的书都有所更换。我头一次进那个房间时，众多书架上排着的是一般文学作品和科学著作，以及房间主人所专长的某个科学分支学科的一般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书架接二连三地被一些专业期刊所无情侵占。

这些期刊篇幅不大，装订简单，每一本充斥的是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众多专论。按字面的意思，这些刊物都算不上书籍，因为它们没有统一的内容。论文和论文之间除了同那门科学学科的某些问题存在些许关联之外，说不上有什么联系。就这样，书架上的书籍日渐减少，期刊却逐日增多。我后来是在阁楼上才又看到了那些书的。雪莱的《诗集》和《物种起源》一道被抛到了那里，堆在做工粗糙的架子上，同盛着菌种的玻璃瓶并排而立。我每次去都发现，那个书房较之先前越来越不雅观，越来越不适于使用了。

这些期刊就是“书本形式”的工业体制的体现。它们具有劳动分工，内含通过对原材料机械加工而成的最大量的产品。由于我厌恶这一排排的卷宗，我时常把它们看作是既可可怜又可憎的东西，占了它们不该占的地方。但现在我打算相信，在20世纪的早期，恐怕还不必把它们从一位自然科学家的工作间请出去。

由于工业体制就其非人文的一面而言，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所以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先定的和谐”，因而将科学思想运用于“生产线”而不触犯科学思想的本质是可能的。无论如何，这或许是在自然科学的早期阶段，处理其任何分支学科的正确途径（我们西方的全部现代科学，即使同西方社会的年龄相比，也显得非常年轻），因为任何尚不成型的思想最初都需要一种“资料”的供应，以便能够自圆其说。然而，同样的方法后来却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被运用于许多思想领域当中，运用到与生命有关、与死寂的自然界没有干系的思想之上，甚至应用到与人类的活动^③相关的思想领域当中。历史思考便属于这些额外的领域之列。在这些领域中，工业化体制的权威在强调着自己的存在。在这里，在一个远比我们西方社会要久远得多的思想领地当中，在一个关乎人而非物的思想领域当中，其实并没有为这样一种认识——现代西方工业化体制是可供人们生活与劳动的最优秀制度——提供任何可靠的保障。^④

这种古老的历史思想王国被现代西方生活的工业化所征服的情景，体现在泰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年，德国杰出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除著有汤因比下面所提到的罗马史外，还写



伊斯兰、刚果人和中国人眼睛里的基督教的肖像

1、2、3 虽然主题一致,但每个图像都折射出艺术家个人特殊的文化和种族环境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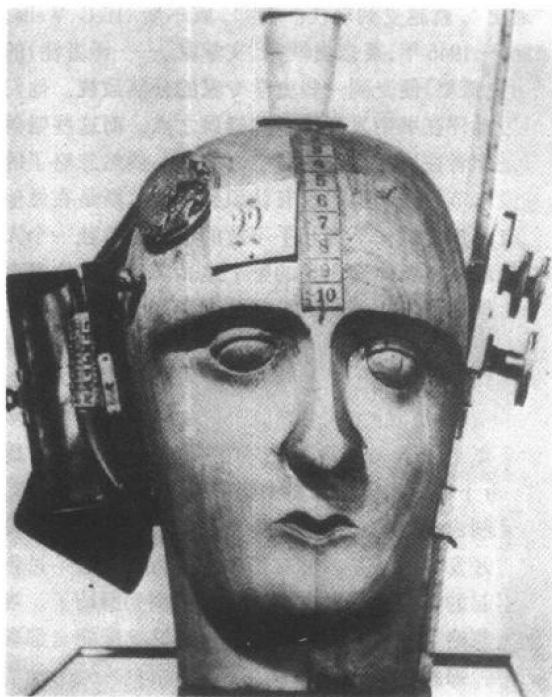
有《年代学》、《罗马货币史》等多部专著及 1500 余篇论文,与汤氏所述有些出入。——译者注)的经历之中。他年轻的时候,写出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这部著作无疑将永远被视为西方历史文学的杰作,这就是 1854—1856 年出版的《罗马共和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Republic*)。但蒙森在这部著作尚未杀青的时候,就几乎为这本书感到羞愧了。于是他将自己的巨大精力和超卓才能转投到了其他方向。蒙森穷毕生精力,组织出版了详尽无遗的拉丁铭文集,并对罗马宪法进行了无所不包的引介注释。《罗马宪法》与《拉丁铭文集成》是纪念碑式的文献,他晚年时宁愿因这两部书而为后世铭记。他的多卷文集由互不关联的专论和论文组合而成,如同多卷学术期刊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由一位作者撰稿罢了。从哪个方面来讲,蒙森都是他那一代西方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那是一代头上被迫顶着工业化体制权威的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自从蒙森和兰克(L. V. Ranke, 1795—1886 年,德国著名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的宗师。——译者注)时代以来,历史学家们将他们最旺盛的精力,都用到在“文集”和期刊中“组装”原材料(碑铭、文献以及诸如此类的史料)的工作上。当他们试图把这些材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的作品时,他们再次求助于劳动分工,并生产出了综合性的历史,如剑桥大学出版社连续数版发行的多卷本历史丛书(指《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等集体编写的巨著。——译者注)。这些丛书是辛勤劳作的纪念物,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所掌握的“事实”知识、机械性技能和组织的程度。它们的规模可同巨大的隧道与桥梁、惊人的水坝与摩天大楼、巨人般的喷气机与宇宙飞船相提并论,它们的编者将被载入西方著名工程师的名册而被人永志不忘。在这种对历史思想领地的征服当中,工业体制已赋予伟大的战略家们施展其才能的余地,并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然而,对一位超脱的、具有头脑的观察者而言,疑问也会油然而生:这种征服毕竟算不上什么可歌可叹的壮举,所谓对胜利的那种自信,不过是一种出自虚假类推的幻觉罢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教师,把他们的“研究班”故意称作“实验室”。对“独创性的工作”(original work)这个术语的含义,他们也许并非是有意识地、但却是相当肯定地限定为发现或核实某些事实以及某些先前未能确认的事实。^⑥这个术语就其最广义的内涵而论,可包括在这类工作基础上写出的各种暂时性质的报告,即供学术期刊或综合性的历史发表的研究成果。目前存在一种贬低由个人思想创作出的历史文学作品的强烈倾向。这样的作品越接近

“通史”,就越受到轻视。例如,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 年,英国史学家、文学家。——译者注)的《历史概要》便受到一些史学专家的公然敌视。他们严厉批评在书中发现的一些错误之点,而这些错误只是作者在进行漫长的时空之旅时,偶然忽略了细微末节。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威尔斯是在做他们自己连尝试一下都几乎不敢的事,以单独一个人的想象来重新体验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对这类事业,他们大概压根儿就没想到有实现的可能性。事实上,目前对于威尔斯那本书的目的和价值,一般读者的评价比专业史家的估价要好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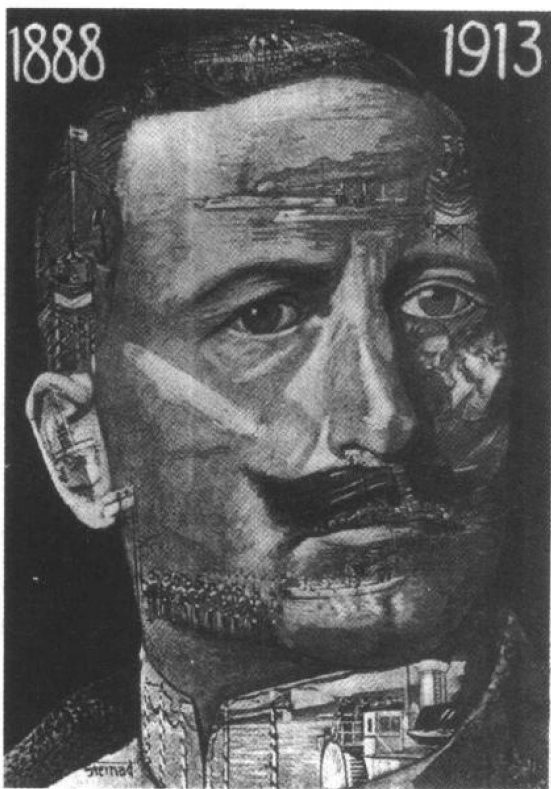
历史思想的工业化已进展到如此地步,它甚至能重新产生出对工业化精神的病态夸张。众所周知,由于精力和能量都集中到将原料转化为光热、动力及制品上,个人或社会团体觉得自然资源的发现与开发本身便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而这一过程所引起的任何后果对人类的价值反倒无所谓了。当别人忽略了开发个人或社会团体能够支配的全部资源时,那些个人或社会团体甚至不由自主地为他们感到担忧。如果他们正好生活在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开发它们的机会又很多的地方,那他们自己就欣然成了物质偶像的奴隶。对于欧洲的观察者来说,这种思想状况看上去似乎是某种类型的美国商人才具有的特征,其实它不过是作为我们整个西方世界特征的一种趋于极端倾向的产物。当代欧洲的历史学家有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的病态会造成相同的损害,所以在他们自己的思维框架内,这类病症也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我们也许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亚历山大大帝在灭掉阿黑门尼德帝国(即波斯帝国,因帝国的缔造者和统治者波斯阿黑门尼德族的成员而得名。——译者注)之后,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由其部将托勒密在埃及建立的独立王朝。——译者注)将帝国的一些支离破碎的残片组合成一个以埃及为基础的强大实体。同时塞琉古王朝(同样是在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由亚氏的部将塞琉古建立的新王朝。——译者注)则将先前那个帝国的亚洲诸行省,归并为另一个强国。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两个强国的人,没有谁会提出关于它们中的哪一个更令人感兴趣或更为重要的疑问。塞琉古王国是希腊文明与叙利亚文明交融的场所,两者的结合孕育出强大的后代:起初,神圣的血缘联系是城邦之间联合的一项原则(希腊城邦的公民认为他们是出自一个共同祖先的血缘集体,这项原则推及整个希腊世界,构成希腊人各邦联合的基础之一。——译者注),这种联合是后来罗马帝国的原型。随后是一系



工业化和民族主义是现代西方人的双面

4.5 上图名为“我们时代的精神”，描述人类智力的机械化。下图是好战的民族主义的形象，系印在一张纪念明信片上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画像。



列宗教——密特拉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大融合。在几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塞琉古王国是当时世界上的人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最伟大国度。即使这个比较短暂的王朝灭亡了很久以后，在其存在期间产生的那些运动仍继续塑造着人类的命运。与此相比，希腊文明与埃及文明在托勒密帝国的结合却没有什么成果。对伊西斯(古埃及女神,冥界之神奥西里斯之妻,国王保护神荷努斯之母,起初司生育等与妇女有关的职能,后在与希腊文化的结合过程中成为统治天地、海洋、生死、命运的女神。——译者注)的崇拜和某些经济与社会组织形式传入了罗马帝国,这便是能够摊在账面上的全部东西。但是,因为意外的气候,我们恰好能得到的有关这两个君主国的原始史料的数量,同它们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上埃及(指尼罗河三角洲以南约至第四瀑布之间的地区,三角洲则为下埃及。——译者注)干旱多尘的土壤,为具有科学知识的西方发掘者提供了丰富的纸草文书,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这些纸草文书准确地记载了当地的农耕方法、手工制造业、商贸、行政管理的信息。而塞琉古王朝的历史却主要是由零星的钱币和铭文、破碎的文字记录拼凑而成的断片。在这里,堪与托勒密时代的纸草文书相比的唯一新资料,就是出自巴比伦尼亚(指两河流域南部,北部在历史上称亚述。——译者注)的塞琉古时代的泥版文书。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托勒密时代的纸草文书把西方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者队伍几乎全部吸引了过去,相当多的对纸草文书一直做考据研究的学者,都倾向于用他们手头能够得到的那些重构历史所需的资料数量、用他们为这种重构工作所付的劳动强度,来衡量托勒密王国的重要意义。

但一个局外的观察者却感到遗憾:为什么他们没有把一部分精力保存起来,用在资料相对贫乏、但同样需要紧张工作的塞琉古史的重构工作上呢?与其将洪水般的光亮倾泻到托勒密埃及的社会经济组织上(因纸草文书的内容主要是社会经济表报,所以西方史学家在这方面用功甚多。史学不是文学,只能有多少史料做多少文章,故汤因比所评失之偏颇。——译者注),不如为有可能增加对人类史更多理解的这个篇章分出一缕多余的亮光。此外,这位观察者还会产生一种心理反应,即他怀疑已经成了托勒密纸草学专家的学者,事先是否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是它从属的那个特定社会、特定时代中最有趣、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吗?”也许他事先对自己提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个领域未经开采的最富饶的宝藏是什么?”他发现答案是